

琯生三器銘文補釋及相關問題研究

黃庭頤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所博士生

提 要

本文針對《五年琯生簋》(4292)、《五年琯生尊》以及《六年琯生簋》(4293)等三器銘文重新進行研究，針對當前的焦點問題，參考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分別就人物關係、銘文補釋、銘文性質等三方面提出補正或新說。人物關係方面主要彙整各家說法，並提出傳世文獻證據，補證「琯生即伯氏」以及「召姜為婦氏」的論述，並同意琯生與召伯虎非兄弟之說；銘文補釋方面，則多針對未有定論之文字，提出新的考釋結論。最後根據前兩部份之所得，對於三器銘文呈現的土地問題加以研究，主要根據「有司」一詞，結合學者對於西周土地制度的研究成果，主張琯生三器銘文並未涉及土地兼併或紛爭，而是召氏家族在王官見證下，依據合法途徑而完成的家族內部土地管理權重分配紀錄。

關鍵詞：琯生三器 五年琯生簋 六年琯生簋 五年琯生尊 青銅器 銘文

琯生三器銘文補釋及相關問題研究

黃庭頌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所博士生

一、前言

傳世青銅器中有兩件「琯生簋」（舊稱召伯虎簋），分別依其銘文紀年稱為《五年琯生簋》（4292）與《六年琯生簋》（4293）。這兩件西周末年的器物，文字古奧，但內容重要，學界很早就意識到兩器當為一對，銘文似可連讀，因此林滙率先發表文章，主張兩器銘文為同一篇文章的前後兩大段。^①

2006年11月，陝西扶風縣五郡西村發現一個青銅窖藏，出土青銅器共27件，其中有兩件銅器，發掘者稱之為「琯生尊」，通高31釐米、口寬32.5釐米、腹深29釐米、腹底徑14釐米。^②兩器銘文內容相同，而且可與傳世器《五年琯生簋》、《六年琯生簋》連讀，故此二器一出，旋即造成古文字學界的研究熱潮，學界普遍稱之為「琯生三器」。新發掘的琯生尊，因其銘文開頭記有「惟五年九月初吉」之句，故一般稱之為「五年琯生尊」。據《五年琯生尊》的銘文看來，顯然可與《五年琯生簋》、《六年琯生簋》連讀，李學勤主張連讀順序為五年琯生簋——五年琯生尊——六年琯生簋，^③本文亦採取此連讀順序。由於此三器內容特殊、人

① 詳見林滙：〈琯生簋新釋〉，《古文字研究》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120-135。後收入《林滙學術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62

② 參見寶雞市考古隊、扶風縣博物館：〈陝西扶風縣新發現一批西周銅器〉，《考古與文物》第4期，2007年，頁3-12。

③ 李學勤：〈琯生諸器銘文聯讀研究〉，《通向文明之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99-105。

物關係複雜，加之部份文字難以釋讀，故而引起相當熱烈之討論，經過數載，大致已凝聚出幾個問題焦點，整理如下：

- (一) 琯生三器的製作順序
- (二) 琯生三器所見人物關係
- (三) 古文字的考釋與釋讀，如：許、宥、刺／柔等字
- (四) 銘文性質的認定

目前學界共識主要有兩點，分別是此三器的器主為琯生，以及《五年琯生簋》與《六年琯生簋》確實為成對的器物。本文將針對上舉第二、三、四點問題，以各家前輩學者的著作所得為基礎，重新選釋三器銘文，進而討論銘文性質，一己之得，不揣淺陋，撰寫成文，尚祈方家指正。

二、琯生三器所見人物關係

過去學界對於琯生三器的人物關係已經作過不少討論，但因人物關係複雜，加上內容特殊，故學者多有不同解讀。儘管琯生三器的人物關係討論已見不少成果，但如何認定銘文所見人名及稱謂代表之意義，牽涉到研究者如何看待此三器，因此凡欲探討琯生三器的銘文內容，便不可避免再次談及人物關係，故本文亦先針對此焦點問題進行探討。

琯生三器銘文雖通讀不易，但人名與稱謂部份尚可辨識，根據三篇銘文內容大致可分析出：琯生、召伯虎、召姜、幽伯、幽姜、君氏、伯氏、婦氏、宗君、公等人名或稱謂，其中琯生、召伯虎、召姜可以視為人名，幽伯、幽姜則可視為諡號，君氏、婦氏、伯氏、宗君、公則是稱謂。從銘文來看，圍繞此事件展開的主要人物有未出現的「召公」、器主琯生、召伯虎以及召姜四人，其他諡號或稱謂皆為此四人之指稱。自從琯生尊出土後，學者多半對於事件的人物已能掌握，惟有人名與稱謂相互繫聯看法不同，以下即以人名為中心，向外繫聯稱謂與諡號進行訓釋，並於前賢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不同想法。

（一）論琏生與伯氏

《五年琏生簋》、《六年琏生簋》過去曾被稱為「召伯虎簋」，經過多年考證，如今已知作器者為琏生，而琏生身份之辯證，學界亦多有論述，本文同意琏生為琏氏之外甥，召氏之分支族子之說。^④此說從琏生諸器，以及《六年琏生簋》銘文「用作朕烈祖召公嘗簋」可得明證。同時另據琏生作《文考宮仲鬲》（744）可知，琏生之父為宮仲，故知其族自宮仲始，已為召氏宗族之分支。一旦確知琏生身份，則琏生三器部份代詞當可逐漸釐清，本文先就琏生與伯氏之關係，進行相關討論。

過往學者對於琏生三器銘文所見之「伯氏」主要有兩種看法：一者為召伯虎；一者為琏生。多數學者主張伯氏為召伯虎，認為召伯虎既為召公之子，又即將繼承召氏宗族，則理應為「伯氏」，同時西周金文如《不娶簋》（集成 4328）等亦見以「伯氏」稱呼宗族族長之例。儘管視「伯氏」為召伯虎之說，具備充份的文例證明，但細究琏生三器銘文卻可發現此說不盡合文意，理由在於五年琏生簋之「伯氏」，乃見於君氏之言，學者普遍同意君氏當為召伯虎之父親一召公，亦即前任召氏宗君，其發佈此命令時當仍是召氏族長，「伯氏」既為宗族族人對族長之稱呼，召公則無理由稱召伯虎為「伯氏」。

既已排除「伯氏」為召伯虎之可能性，則「伯氏」必指琏生，過去主張伯氏為琏生者有王輝、連劭名、王進鋒、邱咏梅等學者，^⑤其主張琏生雖為召氏分支，但為該分支之長子或是其年歲為同輩之長，故君氏稱之為「伯氏」。筆者細究琏生三器銘文，則可發現琏生以「召伯虎」三字稱呼召氏新任宗君，僅有「琏生拜揚朕宗君休」一句是以「宗君」稱呼召伯虎，倘若琏生與召伯虎同輩，僅因其為

④ 張亞初先生認為琏生應讀作「琏甥」，其為姬姓召氏族人，其舅系為姓琏氏。詳見〈西周銘文所見某生考〉，《考古與文物》第 5 期，1983 年，頁 83-89。

⑤ 詳見王輝：〈琏生三器考釋〉，《高山鼓乘集——王輝學術文存二》（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24；連劭名：〈周生簋銘文所見史實考述〉，《考古與文物》第 6 期，2000 年，頁 42-45；王進鋒、邱咏梅：〈五年琏生尊與琏生器人物關係新論〉，《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8 卷第 3 期，2008 年 6 月，頁 46-47。

分支長子或年歲略長之，似乎難以解釋琏生為何以召伯虎全名稱呼宗君。同時琏生之父宮仲雖非嫡子，卻難以推定宮仲必為召公之弟，換言之，宮仲與召公未必同輩，則琏生與召伯虎亦可能非同輩之堂兄弟。

林澧曾於〈琏生三器新釋〉指出「無法肯定琏生與召伯虎父親的輩份關係，琏生既可以是召伯虎的兄弟，亦可為召伯虎父親之兄弟，甚至輩份更高。」^⑥筆者以為其說可參，琏生當為召伯虎之長輩，其年歲甚至可能長於召公，而「伯氏」正是召公對於琏生這位同宗長輩之敬稱。先秦文獻亦可見此種用例：

《禮記·檀弓上》：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共世子也。^⑦

《春秋左傳·昭公十五年》：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王曰：「叔氏，而忘諸乎！……」^⑧

上舉首例之事亦見於《國語·晉語》，晉國太子申生稱狐突為「伯氏」，注云：

⑥ 詳見林澧：〈琏生三器新釋〉，此文原發表於《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網》2008年1月1日，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284。後修改以〈琏生尊與琏生簋的聯讀〉之名發表於《古文字研究》27輯（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206-211。

⑦ 【漢】鄭元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禮記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引嘉慶廿年江西南昌府本，2001年），頁115-116。

⑧ 【西晉】杜預注、【清】阮元校：《春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本》，頁823。

「狐突，晉同姓，唐叔之後，狐偃之父大戎伯行也。」⁹狐突雖與晉公室同姓，並為該族族長，但太子申生必非其族人，故可知此處申生稱其為「伯氏」，乃是敬其為位重年高之長輩。相同之例尚見上舉第二例，周景王稱晉荀礫為伯氏，稱籍談為叔氏，楊伯峻注云：「自以二人皆姬姓之後，而伯、叔之稱，不論因其位之尊卑，抑年之大小。」¹⁰由此可見，先秦稱「伯氏」未必指宗族族長，召氏宗君以「伯氏」稱呼弼生當是此種情形。考慮前後文意以及弼生對召伯虎之稱呼與態度，當可更進一步確認弼生即為「伯氏」。

（二）論君氏、召公與幽伯

歷來學者對「君氏」有幾種看法：一者認為「君氏」為召伯虎的父親召公，亦即幽伯，同時指出「君氏」是「宗君」的一種變稱。¹¹二者認為「君氏」即為召伯虎，認為《五年弼生簋》召伯虎曰「我考」，說明其父已亡故，因此當時召氏宗君應是召伯虎。¹²三者認為「君氏」當為女性，並進一步指出「君氏」當為召伯虎的母親，亦即召姜、幽姜。¹³此三種說法，孰是孰非，則需進一步辯證。

查找先秦文獻與西周文例，見「君氏」者僅有兩條，皆指女性，然而考慮五年弼生簋、尊之銘文內容，則此處之「君氏」難以與女性對象扣合。據文意看來，君氏之令當為宗族分家之令，繼任宗君召伯虎聽罷僅言「余既訊，厭我考我母令（命），余弗敢亂。」若君氏為召公之妻召姜，恐非具備直接與弼生討論分配公家僕庸土田之事的權利。其次，弼生三器銘文又見「召姜」、「幽姜」之稱呼，尤其是《五年弼生尊》銘文，弼生先稱其召姜，又稱其君氏，顯然前後不一，且兩人關係亦不明朗。由此論之，則「君氏」應當指召氏宗君，而非召姜。至於「君

⁹ 徐元誥撰：《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268。

¹⁰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台北：源流出版社，1982年），頁1372。

¹¹ 持此說者眾多，陳英傑曾對此說進行詳盡的梳理，見氏著：《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9年），頁734-737。

¹² 王進鋒、邱咏梅：〈五年弼生尊與弼生器人物關係新論〉，《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頁48-49。

¹³ 王澤文：〈對弼生諸器人物關係的認識〉，《中國史研究》第4期，2007年，頁6-8。

氏」是否可能為召伯虎？筆者以為若「君氏」為召伯虎，則《五年琯生簋》銘文難以通讀，召伯虎不應向琯生頒布宗族命令後，又以極低姿態說出「余既訊，厭我考我母令（命），余弗敢亂。」，故三種說法比較看來，仍當以「君氏」為召氏宗君——召公（幽伯）之說較為合理。

雖然傳世文獻支持「君氏」為男性宗君說法的證據較少，但「君」作為宗主的用法卻多見於商周金文。陳英傑曾指出商金文中「君」字只有一例，此例之「君」即為宗主，而此用法沿襲到西周時期，西周時期族人以「君」或「某君」稱呼族長者，還見於《虢簋》（4167）「休朕寶君公伯錫厥臣弟虢」，此銘之「寶」為修飾人物名稱，「君」則為族人對宗子之稱。¹⁴又如春秋時期的《欒罇》（271）與《國差簠》（10361）皆以「侯氏」來稱呼他們的君長齊侯。由此可見，宗子稱為「君」乃是商代遺留至西周之習慣，而「君氏」可能類似於「侯氏」，是為「宗君」的一種變體，由於琯生三器銘文被認為使用較多當時用語，筆者以為此處亦可視作一例證據。最後，關於召公與幽伯之關係，從六年琯生簋銘文召伯虎云：「我考幽伯、幽姜令」，清楚可知幽伯即為召伯虎之父，亦即君氏，而「幽伯」是其諡稱，可知《六年琯生簋》記載事件發生時，召伯已亡故，宗君當為召伯虎。

（三）論婦氏、召姜與幽姜

學界對於「婦氏」身份的討論很多，主要有兩種看法：¹⁵一者為召伯虎之妻，一者為召伯虎之母。由於其他金文和傳世文獻都未見「婦氏」一詞，因此關於「婦氏」的真實身份，當從銘文內部脈絡梳理，才可得知。

根據《六年琯生簋》銘文可知，召伯虎的母親諡號為「幽姜」，可以確定其

¹⁴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頁744。

¹⁵ 近來裘錫圭針對字形提出新說，主張將「婦氏」改釋為「寢氏」，認為是主管召氏寢宮的家臣，負責出面向琯生送禮並傳達君氏之命，亦可備為一說。詳見裘錫圭：〈復公仲簋蓋銘補釋——兼說琯生器銘「寢氏」〉，《裘錫圭學術論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95-204。

母是嫁與召氏的姜姓女子，《五年琏生尊》則同見「婦氏」與「召姜」，則「召姜」是否等於「幽姜」，而「召姜」是否即為「婦氏」？筆者以為通過《五年琏生簋》以及《五年琏生尊》銘文比對，可得出「婦氏」與「召姜」之關係。首先《五年琏生簋》銘文顯示琏生先獻給婦氏壺，其後琏生與婦氏、召伯虎雙方展開第一次會談，五年琏生尊則是召姜給予琏生帨五、帨以及壺一對，接著兩造再度展開第二次會談。此種相互饋贈、回禮的儀式，說明婦氏極可能就是《琏生尊》所言之「召姜」。其次，兩次會談結束後琏生皆得到君氏惠予之大璋，同時回報婦氏束帛與璜，很難想像若是「婦氏」與「召姜」是兩個身份不同的人物，何以婦氏主導第一次會談，卻於第二次會談時，僅見於琏生回報之束帛與璜之時？而召姜未出席五年正月的第一次會談，卻可主導同年九月對族產分配具決定性意義的第二次會談。由此可知，召姜當為婦氏，兩者只是同一人的不同稱謂。

既已確定婦氏就是召姜，則其是否為召伯虎之母「幽姜」亦需進一步分析。由銘文可知，婦氏對於本次財產分配事件具備極大的影響力，從兩件五年琏生器可清楚看出，琏生並未直接與即將繼任的宗君召伯虎討論君氏所提出的分配方案，而是與婦氏直接進行商談，同時召伯虎對兩者的結論幾乎未有置喙餘地。在《五年琏生簋》紀錄的第一次會議結束時，召伯虎兩次提及「我考我母命」，說明這樣的商談結果，是召伯虎父母之意，顯示「婦氏」極有可能就是召伯虎的母親「幽姜」。更值得注意的是，《五年琏生尊》僅見琏生與召姜的互動，而未見召伯虎出場，只有「琏生拜揚朕宗君休」一句提及。召伯虎此時既已為召氏宗君，而如此重要的財產分配會議，似無理由宗婦與支子主導，而宗君卻不置一詞，因此合理推斷婦氏當為召伯虎長輩，亦即其母。由現任宗君之母與支子一同完成前任宗君遺命，實屬合情合理。或有學者認為「婦」有「妻子」之義，相對於夫或姑而稱，故此處之「婦氏」似乎不應理解為召伯虎之母，¹⁶筆者以為此觀點乃是從召伯虎角度出發，若琏生與召伯虎為同宗兄弟，確實不應稱宗君之母為「婦氏」，但若從本文對琏生身份考察結論來看，琏生至少與幽伯同輩，是召伯虎之長輩，


¹⁶ 王澤文：〈對琏生諸器人物關係的認識〉，《中國史研究》第4期2007年，頁6-8。

而稱召姜爲「婦氏」，亦不爲過。

綜上所論，本文以爲「伯氏」當指琯生，是召氏大宗對其之敬稱，由此推知，琯生的輩份與年歲當在召伯虎之上，可能與召伯虎之父召公同輩或更長。召公死後諡「幽」，故又稱之爲「幽伯」，其妻則爲「幽姜」，即《五年琯生尊》所見之「召姜」、「婦氏」，故琯生與召伯虎，當是年歲輩份較高之小宗與年歲輩份較輕之大宗的關係，至於「婦氏」則是前任宗君之妻，故可具有主導會見之禮以及代行君氏之令的權力。

三、琯生三器銘文補釋

（一）《五年琯生簋》銘文選釋

1. 琯生又（有）事，（召）來合事。

《五年琯生簋》是記載本次事件時序最早的會面內容，本次會面的理由乃因「琯生有事，召來合事」。有事，學界對此主要持兩種看法：一類認爲「有事」是指下文提及的僕庸土田之事；¹⁷另一類認爲先秦文獻和金文的「有事」多指祭祀之事。¹⁸按西周金文文例來看，「事」亦可解爲「使」，故當從何說，則需進一步考察。

以本銘前後文來看，理解爲「祭祀之事」亦較爲突兀。至於「有事」當解爲「有事情」或「有使」？西周金文雖多見「事」借爲「使」者，但多爲「事（使）+受詞」之句式，或指「王出入事（使）人」，未見有作「有使」句式者，故筆者以爲此處當理解爲「有事情」較妥，西周金文除本銘外未見有事者，先秦文獻

¹⁷ 持此類看法者以林漢、朱鳳瀚等人爲主，見林漢：〈琯生簋新釋〉《古文字研究》第三輯，頁125。；朱鳳瀚：〈琯生簋銘新探〉，《中華文史論叢》第1期，1989年，頁84。

¹⁸ 主張祭祀看法者見徐義華：〈新出土《五年琯生尊》與琯生器試析〉，《中國史研究》第2期，2007年，頁20、劉桓：〈五年琯生簋、六年琯生簋銘文補釋〉，《故宮博物院院刊》第3期，2003年，頁49。

將「有事」解為「有事情」者，尙見：

《禮記·聘義》：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¹⁹

《左傳·襄公廿八年》：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²⁰

《左傳·襄公廿九年》：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²¹

《左傳·昭公三年》：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²²

上舉四例「有事」皆可解為「有事情」，除此之外，另見許多文例證據，茲不贅舉，綜觀先秦文獻典籍，「有事」除有祭祀之義外，解為「有事情」者遠多於解為「有使」者，故筆者同意釋「有事情」之說，而所謂「事情」即指僕庸土田之事。

2. 余獻婦（婦）氏以壺，告曰。

學者對於本段銘文主要有兩種理解方式：一種為「琀生獻壺給婦氏，並告訴她君氏之命的內容」；一種則為「琀生獻禮，婦氏給琀生壺並告訴琀生君氏之命的內容」。其分歧之處主要在於各家學者對「告曰」主詞的理解不同，若按照第一種斷句方式，則「告曰」因主詞省略而難以辨認，第二種方式則是將「告曰」的主詞明確地判給了婦氏，但本文認為第一種理解方式，較第二種更為妥切，理由有二。

首先，第一種斷句方式雖省略了「告曰」的主詞，但此種「A + V + B，V」句式，而第二個動詞的主語也是A者，並不罕見。陳英傑在解說《豳公盥》銘文「天令禹專土、陞土、濬川，迺擣方、執征」時，指出「迺擣方、執征」的主語也是禹，並指出這種句式亦見於《師旂鼎》（2089）「師旂眾眾僕不從王征于方雷，使卒友引以告于伯懋父在芳，伯懋父乃罰得聯由三百孚」由此可見，本銘將

¹⁹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禮記注疏》，《十三經注疏》，頁1030。

²⁰ 【西晉】杜預注、【清】阮元校：《春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本》，頁655。

²¹ 同上註，頁666。

²² 同上註，頁721。

「告曰」的主語理解為「余」，亦是符合西周金文文例。其次，在五年琯生尊尚未出土以前，此二種理解方式各有學者支持，純就文句解讀而言，雖未有不合理之處，然而五年琯生尊出土以後，支持此二器銘文可連讀者，咸認為這是兩篇召氏家族針對同一事件之前後兩次協商的紀錄，若兩次會面皆由婦氏告知琯生結果，而琯生未曾執一詞，則斷無「協商」之說，兩篇銘文關係亦顯得難以詮解，故筆者認為本銘當為琯生告知婦氏「君氏之令」的內容，而五年琯生尊正是記載同年九月，琯生家族再次會面，召姜（即婦氏）以正式命令向琯生及其宗族宣佈「君氏之令」的紀錄。唯有如此理解，才能明白琯生何以鑄造兩篇內容相似但時間不同的銘文，準此，本文支持將此段銘文斷讀為「余獻婦氏以壺，告曰」亦即「我（琯生）獻壺給婦氏，並告訴她說」。

3. 弋伯氏從話（許）。

「弋伯氏從許」是本篇銘文通讀的關鍵之處，由於學者對於「許」字解讀不一，進而影響對三篇銘文之認識，故此字必須詳細檢討。許字此處作「話」，五年琯生尊作「許」，故知「話」乃「許」之或體，該字又見於以下諸器：

鬲攸比鼎（2812）：女（汝）受我田，牧弗能許鬲比。

召鼎（2838）：限許曰：「鬻則俾我賞馬，效父則俾復厥絲束」贊、效父迺許。

五祀衛鼎（2832）：正迺訊厲曰：「女（汝）貯（賈）田不（否）。」厲迺許曰：「余審貯（賈）田五田。」

毛公鼎（2840）：愬（擁）于小大政，粵朕立（位），虢（赫）許（戲）上下若否，孚四方，死（尸）母（毋）童（動）余一人在立（位）。

以上三器皆出現「許」字，然因毛公鼎之「許」可確定通假為「戲」，故諸家多不論，重點在討論琯生器、《鬲攸比鼎》以及《五祀衛鼎》的「許」字用意。楊樹達論鬲攸比鼎時曾引《說文》：「許，聽也。」認為此銘之許當為「聽」義，乃指攸衛受鬲比田，卻不聽從其言。然而又舉召鼎銘文對比，言此文責衛牧之弗

能許，彼文記限之許，知許為訴訟之恒用語也。²³林滙、李學勤皆同意此看法，並試圖將許與訊、訟等訴訟用語連結，更進一步認為琯生三器乃是紀錄訴訟之事。²⁴然而從上舉銘文而論，「許」未必然與訴訟有關，鬲攸比鼎之「許」按《說文》解為「聽」亦文從字順，因衛牧為鬲比田牧，卻不能聽從其言而遭告官，「弗能許」乃此官司產生之原由，並非指官司本身。至於召鼎斷句雖仍有疑慮，但依據前後文意，「許」似可解為「答允」，意即兩方皆同意之協商，此處用法與《尚書·金縢》「爾不許我」相同。由此而論，西周金文之「許」可作「聽」與「答允」兩種用法，不少學者亦認為琯生器之「許」可解為「答允」，亦即希望伯氏承諾使附庸土田不要散亡，²⁵其說可從。此外《說文》云「從，隨行也」亦即隨順。按前句銘文所述，召氏家族當存在僕庸土田之紛爭，故「弋伯氏從許」乃是君氏希望琯生答允，從旁協助處理公家僕庸土田之事。

4. 公庀其參，汝則庀其貳；公庀其貳，汝則庀其一。

此字諸家釋讀不同，主要有兩個方向，一者釋陽部字，讀為「讓」、「蕩」、「盪」、「當」等字，一者釋鐸部字，讀為「拓」、「度」等字，兩者讀音雖異，但釋義皆盡量朝「取得」、「佔有」方面理解。筆者以為就字形而論，此字从广从石，當从石聲，應為鐸部字的可能性較高，釋「宕」為鐸部字的諸家中以王占奎的說法較具影響力，其將「宕」通為「宅」，或作「度」，訓為「居」即佔有之義。²⁶傳世文獻如《詩經》、《尚書》可見不少「宅」訓為「居」之例，而包山楚簡可見「東石公」、「東宅公」等異文，以及清華簡〈金縢〉「周公石東」，整理小組通為「宅」訓「居」，可與《尚書》「周公居東」參照，由此可見从石聲之鐸部字，確實可與「宅」字相通，而宅、度訓「居」之例亦多見。

筆者同意王占奎釋「宅」訓「居」的說法，但不同意其「佔有」之說，沈培

²³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45-46。

²⁴ 林滙：〈琯生尊與琯生簋的聯讀〉，《古文字研究》27輯，頁206。《通向文明之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101。

²⁵ 馮時：〈琯生三器銘文研究〉，《考古》第1期，2010年，頁73。

²⁶ 王占奎：〈琯生三器銘文考釋〉《考古與文物》第5期，2007年，頁106。

亦指出「佔有」之說乃作者衍伸，「居」本身並無佔有之意。至於「居」該如何理解？《廣雅·釋言》云：「居，據也。」王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名〉云：『據，居也。』〈晉語〉今不據其安」韋昭注亦云。」²⁷徐元誥則言：「據，居也。言驪姬之謀，不居安存而處危亡，不可謂能謀。」²⁸《說文解字注》云：

據，仗持也。段注：謂倚杖而持之也。杖者，人所據，則凡所據皆曰杖。據或作据。揚雄傳：三摹九据。晉灼曰：据，今據字也。按何氏公羊傳注據皆作据，是假借拮据字。²⁹

由此可見，「據」一作「据」，無論聲音字形都與「居」相當密切，而文獻又見「據」訓「居」者，說明兩者義素有相重之處。至於如何理解銘文所言「公家土田附庸」與「居」之關係，藉由傳世文獻則可獲得部份線索：

《穀梁傳·宣公十五年》「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灶蔥韭盡取焉。」

史學界普遍認同這是一段描述西周井田制度的文字，意即西周井田以九百畝為一個經濟單位，其中一百畝為公田，其餘八百畝為私田，公田之收成必須上繳領有土地的貴族。此段文字前後見二「居」字，意義皆不相同，「公田居一」當訓「據」，意指公田據有其中之一；「古者公田為居」之「居」為「居住」，乃言「古人以公田為中心居住」。根據銘文內容而論，君氏當為擁有公田稅收之大貴族，僕庸土田皆為其之領地，相同情況亦見於傳世文獻：

²⁷ 【清】王念孫著：《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155。

²⁸ 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253。






²⁹ 【漢】許慎、【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洪葉出版社影印經韻樓藏本，2001年），頁603。

《左傳·莊公廿八年》：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³⁰

此段文字雖言「居」，實指諸公子接受分封的紀錄。太子申生、重耳、夷吾三公子所居之地，同時也是他們的領地，眾公子所領有皆為偏鄙之地，唯有驪姬二子分封於絳。故此處之「居」表面義雖然解釋為「居處」，但背後卻帶有「領有、據有」之意。因此筆者以為銘文之「宕」當釋為「宅」訓為「居」，理解為「據有、領有」之意。

（二）《五年琿生尊》銘文選釋

1. 蔑五、（帑）

本句銘文有兩種斷句方式，牽涉到諸家對「五」下一字的理解不同，一者釋「尋」，讀作「幘五尋」；一者釋「帥」，讀做「幘五，帥」。「戔」字形从戈从，與「蔑」近似，諸家多解為「幘」，《說文》「幘，蓋幘也。」是古代用於覆蓋的某種織品。³¹「」字，李學勤、陳昭容、吳鎮鋒、林滙等人皆釋「尋」，認為「」與「」字形相類，是修飾「幘」的度量單位，但陳昭容亦指出甲骨、金文多次出現「尋」字，都作長度單位，故此處用於長度單位是金文首見。³²陳英傑、馮時則釋「帥」，即佩巾，陳文無說，馮時亦無對字形說解，僅引「帥」於傳世文獻之用法。³³此字字形難解，其形與「」或「」都不能完全吻合，同時

³⁰ 【西晉】杜預注、【清】阮元校：《春秋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本》，頁177。

³¹ 陳昭容、內田純子、林宛蓉、劉彥彬：〈新出土青銅器〈琿生尊〉及傳世〈琿生簋〉對讀——西周時期大宅門土地糾紛協調事件始末〉，《古今論衡》第16期，2007年6月），頁42。

³² 李學勤：〈琿生諸器銘文連讀研究〉，《通向文明之路》，頁102；陳昭容、內田純子、林宛蓉、劉彥彬：〈新出土青銅器〈琿生尊〉及傳世〈琿生簋〉對讀——西周時期大宅門土地糾紛協調事件始末〉，《古今論衡》，頁42。

³³ 陳英傑：〈新出琿生尊補釋〉，《考古與文物》第5期，2007年，頁110。；馮時：〈琿生三器銘文研究〉，《考古》第1期，2010年，頁71。

根據前賢對於西周金文的量詞研究，³⁴亦未見織品後綴量詞者，筆者以爲「𦘔」字不應視爲量詞，而是另一織品之名，故本銘當斷讀爲「幘五，𦘔」。分析此字字形，左半部件當从「𠂔」，陳劍釋「贛」字時曾舉《伯父鼎》³⁵（2465）「𦘔」，而此字右半所从部件，與𦘔左半部件相似，僅僅是方向不同，《說文》亦見「𦘔」，亦持也，从反𠂔。」由此可知，此字左半部件當从反𠂔，爲執巾之意，此从巾从𠂔之字還見於《戎佩玉人卣》（5342）「𦘔」，而𦘔字左半部件當是𦘔的一種省體，筆者以爲此字當隸定爲「幘」，可能是「幘」本字。《說文》「幘，禮巾也，从巾執聲。」段注云：「篆體二徐皆作幘，大徐曰从執，小徐曰執聲，皆誤。今正幘輪瑞切十五部，今不見經典，恐亦悅之或體。」³⁶顯然段玉裁認爲「幘」字从執从巾，亦即文獻所見的「悅」字。文獻可見數條「悅」作爲佩巾或致贈之物的紀錄：

《詩經·召南·野有死麕》：「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毛亨傳：「悅，佩巾也。」³⁷

《儀禮·士昏禮》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悅，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³⁸

《禮記·內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悅、萑蘭，則受而獻舅。³⁹

上引第一條〈野有死麕〉之「悅」，毛亨明確指出就是「佩巾」；至於第二條《儀禮·士婚禮》乃指父母送出嫁之女時，母親會將五絲採繩以及佩巾結於其身，並

³⁴ 關於西周金文量詞研究，可參照潘玉坤：《西周金文語序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67-199。趙鵬：〈西周金文量詞析論〉，《北方論叢》第2期，2006年，頁60-62。

³⁵ 陳劍：〈釋西周金文的「贛」字〉，《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8。

³⁶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361。

³⁷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100。

³⁸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十三經注疏》，頁61。

³⁹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十三經注疏》，頁522。

教誨之；第三條《禮記·內則》指媳婦獲贈飲食、衣物、佩巾等，需接受且獻予公婆。儘管文獻證據的背景與本銘不盡相同，不過仍可證明「帨」確實可作為致贈之物。筆者以為此處釋「帨」，同於經典的「帨」，可視為婦氏贈與琯生之佩帨，此物與「幘」同為織品，故此段銘文可翻譯為「婦氏贈與琯生五幘、帨以及壺一對。」

2. 其兄公，其弟乃

自《五年琯生尊》出土後，諸家對此句銘文隸定大致相同，皆將「𧈧」釋為「兄」但解釋多有歧異。諸家學者多認為召伯虎為兄長，琯生為弟，召伯虎決策事務時，琯生應順從或因此得福，唯有馮時認為琯生應為召伯虎之兄或長輩，但君氏遺命則重新強調召伯虎年紀雖幼，實為宗家，琯生雖長，卻為旁支，故琯生應謹守作為宗族之「弟」的本份，不宜有所僭越。

據前節結論可知，本銘的「伯氏」當指琯生，顯示琯生與召伯虎並非兄弟關係，則本句銘文之「其兄」、「其弟」的解釋該如何理解？筆者以為「其」在金文中多為第三人稱代詞，此處亦不例外，而琯生與召伯虎既非兄弟關係，則「其」就難以視為某人的代詞，從銘文前段「余宕其三，汝宕其貳」之句來看，筆者頗疑「其」當仍為僕庸土田的代詞，則「其兄」可能是「僕庸土田（屬於）哥哥的部份」，「其弟」則為「僕庸土田（屬於）弟弟的部份」，故「其兄公，其弟乃」或可解為「僕庸土田（屬於）哥哥的部份歸給公家，僕庸土田（屬於）弟弟的部份則歸與你」。儘管召伯虎年歲輩份都少於琯生，但因其為宗子，仍可繼承召氏家族中屬於長兄部份的財產，至於琯生雖然年歲較長、輩分較高，卻身為支子，故繼承其中屬於弟弟的部份。除了明確兩者繼承的財產內容，君氏亦以此句話點醒琯生需恪守支子身份，謹遵「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的儀節，不可因公家給予財產管理權力而產生僭越行為，由此亦可較順當地銜接銘文末段琯生告誡後代子孫之語。

3. 其有敢變茲命，曰女事召人，公則明亟

李學勤認為此段銘文當為琯生誓詞，其並指出「公」指召公，「亟」當為「殛」，《爾雅·釋言》云：「誅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侯馬盟書有「吾君則明殛」、「頃公大冢謫殛」等語，具與此相近。

④〇其說可從。

本文以為此三句銘文，若按次序順讀則難以通曉，「公則明亟」當為「其有敢變茲命」的處理方式，故兩句當連讀，至於「女事召人」，筆者認為是強調琯生一族此後需肩負服事召人的責任，是作為前後兩句銘文的補充說明。「變茲命」學者普遍理解為「變亂此命令」，琯生既然身為召氏家族的支子，服事召人自是其責任，西周金文「女」多通作「汝」，故「汝事召人」即為「你服事於召人」。故本段銘文應理解為「若是後代子孫有敢變亂這個命令者，公家則會給予懲罰」，因為「你是服事於召人」的。

（三）《六年琯生簋》銘文選釋

1. 公稟貝用獄誅

此句銘文要點在於「稟貝用獄誅」，諸家學者大致同意此句是指公家拿貝用於獄誅之事，唯文意理解不同。主張爭訟銘文的學者認為此指召伯虎以入束帛、金錢的方式影響了獄訟審判，故「稟貝用獄誅」的對象是有司，此句話可視為召氏家族以宗族勢力影響西周司法制度的重要證據。至於主張分家說的學者則認為此為召伯虎用貝平定了獄誅之事，故使用對象為僕庸土田，此亦為族內事務，無涉西周土地或司法制度破壞之問題。支持後者說法之學者，對於「獄」之解釋多引《說文》「獄，确也」認為有確正之義，然而細查段注則可知「确」乃指堅固牢靠之義，實難以引申為確正之義。^{④一}古書常見「獄訟」、「獄刑」連言者，筆者頗疑此處亦當視為「獄誅」連言，意即「獄訟紛擾」，然此推論文獻無徵，尚待更進一步考察。

西周春秋時代，大宗確有替族人處理獄訟事件的責任，《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紀錄梗陽人有獄訟，而大宗以女樂賄賂之事，似與召伯虎「稟貝用獄誅」的行為類近，只是銘文未見「賂」字，召伯虎此處亦未必為賄賂之舉，可能僅是以貝幣

④〇 李學勤：〈琯生諸器銘文連讀研究〉，《通向文明之路》，頁73。

④一 徐義華：〈新出《五年琯生尊》與琯生器銘試析〉，《中國史研究》第2期，2007年，頁7。

平定獄訟紛擾。

2. 為伯有祇有成

諸家學者對本銘解讀多有看法，其問題焦點主要在於「為伯」二字究竟是召伯虎自稱或是稱呼琿生？筆者以為召伯虎向琿生自稱伯氏與此處文意甚為不合，若從琿生委託召伯虎稟貝影響獄訟審判角度而論，召伯虎似不必以如此卑下之口吻，表達任務達成之喜悅。綜上所論，筆者以為「伯」或「伯氏」皆是稱呼琿生，因此「為伯」之「為」當訓「助」，此訓釋見於《詩經》、《尚書》，故「為伯」亦即「幫助伯氏」。

𠄎，學者多據《三體石經》釋為「祇」，陳初生訓「定」、「安」。《國語·晉語》「謀既成矣。」韋昭注：「成，定也。」祇與成對文，則義與定近。《詩經·小雅·何人斯》「壹者之來，俾我祇也。」鄭箋：「祇，安也。」⁴²故「有祇有成」亦即「有安有定」，指召伯虎幫助琿生安定獄擾之事。

3. 獻伯氏，則報璧

此處斷句因研究者對「伯氏」認定不同而有所差異，本文認為「伯氏」既為琿生，則「獻伯氏」的主語當為召伯虎，故主張將之屬上讀，亦即召伯虎言「今余既一名典，獻伯氏。」可知召伯虎在封田名典的任務完成後，將典簿交予琿生。「則報璧」的主語為伯氏（琿生），乃言琿生則回報玉璧，以完成禮儀，楊樹達指出「則報璧」者，謂伯氏以璧報召伯虎之田也。文不更言伯氏者，省文也。⁴³其說可從。

四、琿生三器銘文性質探析

琿生三器銘文為西周召氏宗族分家紀錄，內容涉及社會制度以及土地問題。過去不少學者認為琿生三器銘文與西周中晚期土地兼併有關，但本文認為琿生三器銘文其實並未如此複雜，僅是一則宗族內部土田產權的分配，並於王官見證下，

⁴² 陳初生：《金文常用字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17。

⁴³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頁421。

依據合法程序轉移土地的紀錄。此論點可由兩方面證之。

（一）王官「有司」的出現

《五年琯生簋》與《六年琯生簋》銘皆提及「有司」一詞，此名詞多見於和土地制度有關的銘文之中，朱鳳瀚指出西周凡是涉及土地獄訟或轉讓之事，皆需經過王或大臣裁決，並由有司負責進行土田戡定與封疆，這些有司主要包括司徒、司馬、司空，他們是王朝下屬的地方官吏，各職掌一塊地域上的不同事宜。⁴⁴

那麼需要進一步探問的是，「有司」作為西周王朝的王官，其參與宗族內部土地轉讓過程所產生的功能為何？據何樹環的整理，在土地契約訂定的過程中，王官可有評定價格、約劑製作、履勘田地的公證人以及土地變更後疆界地圖的收執者四項作用。⁴⁵本次土地轉讓並無涉及買賣行為，故有司無評定價格的工作，至於履勘田地以及收執土地變更之疆界，據《六年琯生簋》銘文可知召伯虎在協助琯生處理完成僕庸土田獄擾之事後，曾詢問兩次有司關於土田的封疆名典之事，說明「有司」的確在君氏遺命頒布的一年內，根據內容執行劃定土地疆界的工作，並將之登錄於典冊之中，並由官方負責備存。因此，僅有「製作約劑」一項工作需進一步確認。

《周禮·秋官·司約》云：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次之……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鄭注云：

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

⁴⁴ 朱鳳瀚：〈琯生簋銘新探〉，《中華文史論叢》第1期，頁91-92。

⁴⁵ 何樹環：《西周土地所有權研究》（台北：花木蘭出版社，2010年），頁102。

孫詒讓《周禮正義》云：

大約劑事重文繁，故銘勒彝器，藏於宗廟，若鐘鼎盤盂諸重器，通謂之宗彝……小約劑，萬民約者也，對邦國為小也……小約劑事輕文約，則書於竹帛，取足檢考而已。

《周禮·秋官·司盟》云：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則使之盟詛。

由此可知，約劑除了備份於官方外，有爭訟時亦可依據其內容進行裁決，說明約劑具有正式且合法的效力。那麼約劑的使用在於何種場合？珣生三器是否某種程度上可視為上述所謂的大約劑？

西周有不少提及土地轉讓的銘文，前輩學者對此曾進行深入且精當的研究，何樹環《西周土地所有權研究》據召卣等八篇關於土地轉讓的銘文，指出土地轉讓時需要向官方報備，使契約合法化，然後由官方派遣執事有司根據契約劃定土地疆界，經過這樣的程序，契約方才完全的合法並且產生效立。⁴⁶何氏所言主要針對召卣、格伯簋等具體買賣、交換或賠償土地的銘文。換言之，無視周天子所有權的土地買賣交換行為，尚需代表官方的有司進行登錄約劑，那麼召氏宗族內部分配財產的土地轉讓行為更是需要向有司報備，製作約劑，才能進入合法程序並產生效力。《五年珣生尊》銘文見「有司眾盟二犀」，歷來學者說法不一，近日何景成提出「盟」當釋「注（鑄）」，「二犀」通假為「二劑」，亦即有司參與鑄造二約劑之工作，⁴⁷其說可參。本文認為此二約劑可能是同時鑄造的《五年珣生簋》與《六年珣生簋》，若從此言之，則珣生二簋不僅為文獻所言之大約劑，亦

⁴⁶ 何樹環：《西周土地所有權研究》（台北：花木蘭出版社，2010年），頁102-103。

⁴⁷ 何景成：〈說「有司眾注二犀」〉，《古文字研究》第廿九輯（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330-334。

可說明西周時期即便土地轉讓未涉及買賣、交換或賠償等行爲，仍需經過官方認可並且製作約劑，加以存證。

綜上所論，琯生三器所見的「有司」則是發揮其中三項功能，即是參與土地分配現場並製作約劑，使君氏之命內容取得官方的認可。召氏宗族的土地轉讓，通過上報王官的程序，使變更後的土地具有合法性，它不僅保障了琯生日後的管理權力，同時因為登錄名典而使王官有檔案備考，故可確保後世子孫不會因此而爭訟。

（二）家族內部分產之事實

琯生三器銘文的土地沒有經過買賣、訴訟或冊封等手續，而是根據君氏之遺命而進行分配。同時召氏家族當爲召公一支後代，其身份特別，乃是所謂的王官兼諸侯，因此本次事件所分配之土地有其特殊之處，不宜視作一般的土地轉讓，而本文主張琯生三器應視爲家族內部的土地分配。

基本而論，學者普遍同意西周宗法制度是以父權大家長爲基礎，並結合許多支族與家族的氏族政治型態，故氏族爲一共同體。裘錫圭曾利用《逆鐘》（62）、《不其簋》（4328、4329）、《陳逆簋》（4630）等西周銅器銘文討論宗法制度下的所有制，其以爲大宗宗子是整個宗族的財產支配者，擁有家族經濟的主管權，小宗族人雖擁有一部份的獨立經濟，但小宗之長對於其所得的財產支配權，仍舊需服從於大宗宗子對整個宗族財產的支配策略。⁴⁸

筆者以爲通過琯生三器銘文內容，可相當程度印證學者的研究成果。首先，根據《五年琯生簋》、《五年琯生尊》二器銘文可知身爲大宗宗子之君氏，計畫將公家僕庸土田的一部份給予琯生管理，並提出兩套分配方案，希望琯生擇一選之。琯生此時已貴爲西周王廷之宰，其必然擁有自己獨立的財產，但是當君氏提出由琯生管理僕庸土田之事時，乃是以一族之長的身份命令小宗接掌管理公田事務，而身爲小宗之琯生僅能服從君氏命令，接受協助管理宗族共產的任務，並就

⁴⁸ 裘錫圭：〈從幾件周代青銅器看宗法制度下的所有制〉，《裘錫圭學術文集·古代歷史、思想、民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02-209。


君氏提出之方案擇一進行，充分顯示出大宗宗子擁有支配全族財產的權力，以及小宗族人需服從宗君的義務。其次，根據《六年琏生簋》銘可知，儘管君氏曾命琏生處理宗族僕庸土田繁多的擾亂，但實際著手處理者則是繼任的宗子召伯虎。此器銘文由兩段召伯虎與琏生的對話組成，第一段為召伯虎向琏生告慶，說明其以貝幣平定僕庸土田的擾亂之事；第二段則是告知琏生，召伯虎已請有司就前年分配財產的方式，進行封疆錄典的工作。此段銘文證實西周宗法制度下，宗君仍舊主導宗財產的管理與支配權，琏生雖已答應君氏管理宗族五分之二的財產，但無論是實際的平定擾亂或是封疆定界，仍需由宗君召伯虎出面，說明宗族共產制的最高管理人仍是家族的族長。

值得注意的是，召伯虎雖擁有召氏宗族土地支配與管理權，但所有權仍歸屬於周天子。召氏家族是召公奭的後裔，其身份為王官兼諸侯，土地的主要來源是文王時期分得的采邑，而且世代繼承，即是所謂的「世祿」。王官兼諸侯的采邑內容和封建諸侯類似，亦即銘文提及之「僕庸土田」，根據李朝遠的研究，王官兼諸侯從僕庸土田所徵得的田賦，必須上繳周王室，說明他們僅擁有土地的佔有權和治理權，但是土地的所有權仍然屬於周王室，這種采邑是西周土地制度下較為特殊的存在，僅限於開國已前所分有采邑的氏族。⁴⁹儘管李朝遠對於琏生器的理解有些不同，但本文仍然同意上述提出的概念，同時王官「有司」的參與，可進一步證明李說。

綜上所論，琏生三器銘文之性質當為分家紀錄，其記載西周召氏宗族面對僕庸土田的擾亂時，選擇通過分配管理權的方式，在王官的見證之下，將部份公家僕庸土田授予琏生管理，同時藉由大宗小宗的合作以解決土田糾紛，並在事後重新對土地封界登錄，展現出宗族勢力凝聚，以及該家族對於周天子土地所有權之尊重。

⁴⁹ 李朝遠：《西周土地關係論》，頁 156-162。

五、結語

本文根據琯生三器銘文內容，從人物關係、銘文選釋以及性質重探三方面進行論證，並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補証或不同的意見。人物關係方面，主要論點在於支持銘文所見之「伯氏」為琯生之說，並舉出傳世文獻加以對照，並認為婦氏、召姜、幽姜當為一人，由此重新論證琯生、召伯虎與婦氏間的人物關係。銘文選釋方面，除補證過往學者說法外，提出「公扈其參」當釋「居」，訓「據」；「其兄公，其弟乃」當譯為「其中屬於兄長的部份歸公家，屬於弟弟的部份歸你」；「」隸定為「帆」釋為「帑（帛）」等說法。至於性質重探方面則從土地制度方面進行論述，試圖分析琯生三器銘文所反映之情況，認為琯生三器銘文其實並未如此複雜，僅是一則家族內部土田產權的分配，並於王官見證下，依據合法程序轉移土地的紀錄。以上論點皆為筆者一得之見，撰寫成文，尚祈方家指正。

參考書目

1. 古籍文獻

【漢】許慎、【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洪葉出版社影印經韻樓藏本，2001年）。

【清】阮元校：《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出版社，2001年）。

【清】王念孫著：《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2. 近人專著

王輝：《高山鼓乘集——王輝學術文存二》（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何樹環：《西周土地所有權研究》（台北：花木蘭出版社，2010年）。

林澧：《林澧學術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12月）。

李學勤：《通向文明之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金東雪：《西周銘文琯生三器集釋》（吉林：吉林大學古籍所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

年)。

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台北：源流出版社，1982 年）。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陳初生：《金文常用字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9 年）。

陳劍：《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 年）。

潘玉坤：《西周金文語序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錢宗範：《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年）。

3. 期刊論文

王占奎：〈琀生三器銘文考釋〉《考古與文物》第 5 期，2007 年，頁 105-108。

王澤文：〈對琀生諸器人物關係的認識〉，《中國史研究》第 4 期，2007 年，頁 6-8。

王進鋒、邱咏梅：〈五年琀生尊與琀生器人物關係新論〉，《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8 卷第 3 期，2008 年 6 月，頁 45-49。

何景成：〈說「有司眾注二犀」〉，《古文字研究》第廿九輯（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頁 330-334。

林澧：〈琀生尊與琀生簋的聯讀〉，《古文字研究》27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206-211。

朱鳳瀚：〈琀生簋銘新探〉，《中華文史論叢》第 1 期，1989 年，頁 79-95。

吳鎮鋒：〈琀生尊銘文的幾點考釋〉，《考古與文物》第 5 期，2007 年，頁 103-104、111。

徐義華：〈新出土《五年琀生尊》與琀生器試析〉，《中國史研究》第 2 期，2007 年，頁 20。

馮時：〈琀生三器銘文研究〉，《考古》第 1 期，2010 年，頁 69-77。

陳昭容、內田純子、林宛蓉、劉彥彬：〈新出土青銅器〈琀生尊〉及傳世〈琀生簋〉對讀——西周時期大宅門土地糾紛協調事件始末〉，《古今論衡》第 16 期，2007 年 6 月），頁 32-52。

- 陳英傑：〈新出琯生尊補釋〉，《考古與文物》第5期，2007年，頁190-110。
- 裘錫圭：〈從幾件周代青銅器看宗法制度下的所有制〉，《裘錫圭學術文集·古代歷史、思想、民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02-209。
- 裘錫圭：〈復公仲簋蓋銘補釋——兼說琯生器銘「寢氏」〉，《裘錫圭學術論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95-204。
- 趙鵬：〈西周金文量詞析論〉，《北方論叢》第2期，2006年，頁60-62。
- 劉桓：〈五年琯生簋、六年琯生簋銘文補釋〉，《故宮博物院院刊》第3期，2003年，頁48-52。
- 張亞初：〈西周銘文所見某生考〉，《考古與文物》第5期，1983年，頁83-89。
- 連劭名：〈周生簋銘文所見史實考述〉，《考古與文物》第6期，2000年，頁42-45。
- 寶雞市考古隊、扶風縣博物館：〈陝西扶風縣新發現一批西周銅器〉，《考古與文物》第4期，2007年，頁3-12。

附錄一



五年琯生簋銘文拓片

附錄二



圖二四 五年琯生尊甲銘文拓本（約35）



圖二五 五年琯生尊乙銘文拓本（約35）

• 9 •

五年琯生尊銘文拓片

附錄三



六年琯生簋銘文拓片

Complementary Explanation of The Inscription and Focus Research of Three Bronzes of Zou Sheng

Huang, Ting-Chi

Ph.D. students,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bout the study of inscriptions of “Five Year Zhou Zheng Gui” (4292), “Five Year Zhou Zheng Zuen” and “Six Year Zhou Zheng Gui” (4293), mainly focus on characters' relationship, explanation and character of the inscriptions, by referencing to senior scholars' study. First, compiling major argument of character relationship and putting forward evidence in the traditional text, to proof that “Zou Zheng is BoShi”, “Zhao Jiang is FuShi” and “Zou Zheng and Zhao Baihu non brothers”. Second, focus on the inconclus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put forward the new explanation. The final part is the study of land issues recorded in these three bronze, according to the former two parts of this paper. The discussion would start from the word “YouSi,” by scholars' study, then argue that the inscriptions of these three bronzes of Zou Zheng is not about the annexation of land, but the record of redistribution of power of land administration within the Zhao's family, which is witnessed by “WangGuan” and followed legal process.

Keywords: three bronze of Zhou Zheng, Five year Zhou Zheng Gui, Six year Zhou Zheng Gui, Five year Zhou Zheng Zuen, Bronze, inscription

